

# 社会学对通识教育的承诺： 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 中的三个面向\*

孙飞宇

---

**【摘要】** 本文将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这一文本置于其本人的思想发展史之中，发现“社会学的想象力”这一主张同时也是其通识教育思想的体现。在通识教育研究的视野下，这一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对“焦虑”和“不安”的回应贯穿全书，是米尔斯对社会学的直接期待；其次，理性与自由的承诺最终意味着《社会学的想象力》将社会学视为一种公共实践；最后，该书与韦伯《科学作为天职》这一演讲之间在结构和主张上都存在深入的关系，堪称《科学作为天职》的美国版本。这三重面向同时也代表着社会学的学科传统能带给普遍意义上之大学教育的宝贵思考资源。

**【关键词】** 《社会学的想象力》 通识教育 社会学

**【作者简介】** 孙飞宇，社会学博士，北京大学元培学院副院长，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长聘副教授，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

**【中图分类号】** C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7 - 1125 (2023) 02 - 0036 - 26

---

1945年，哈佛大学各个学科的著名教授组成的委员会共同撰写了《自由社会中的通识教育》一书，<sup>①</sup>书中强调了大学教育是为了培养完全的人，

---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对中国大学生群体社会心态的精神分析维度研究”（21BSH027）的阶段性成果。

① 该书在中国大陆被翻译为《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参见哈佛委员会：《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李曼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并在随后成为美国通识教育的基本文献。这本书以及对这本书的批判代表了20世纪美国诸多大学（如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等）所展开的一系列关于大学本科教育应该如何改革的讨论和大规模实践。不过，在这些讨论中大部分涉及具体实践的内容都与制度设计和课程改革有关。在这些讨论和实践中，发表于1959年的《社会学的想象力》一书几乎没有进入大多数相关专家视野之中。

在社会学界，米尔斯的《社会学的想象力》这部作品长期以来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近年来，中文学界对这部作品的研究和理解也逐渐深入。<sup>①</sup>然而，在中文学界和英文学界之中，无论是社会学研究还是教育学研究，对这部作品所隐含的米尔斯的教育思想都尚未做出深入的开掘。闻翔等比较过米尔斯在这部作品中所显露出来的教育思想和帕森斯之间的不同。<sup>②</sup>不过，他们引用的是米尔斯对美国一般高等教育的批评，而并非其对通识教育的认识。1980年，罗伯特·斯陶佛（Robert E. Stauffer）明确将米尔斯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一书中所说的“具有自我教育能力的”人作为讨论通识教育的起点之一。<sup>③</sup>但总体而言，对于米尔斯教育思想的讨论，尤其是关于社会学与通识教育之关系的研究，在中英文学界都较为少见。<sup>④</sup>本文认为，米尔斯在其工作中，尤其是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一书中，的确存在关于教育尤其是通识教育的思考线索。这一线索是我们理解他的思想乃至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学与通识教育之关系的重要入手之处，同时对于讨论通识教育也有别具一格的启发意义。

## 一、引言：社会学的想象力与通识教育

正如多位学者所指出的，该书中对于社会学的想象力的诸多描述和分析

- ① 尤其以闻翔为代表的学者，在近年来对于该作品的研究，已经深入米尔斯的个人思想史和此书的具体社会、政治背景，为中文学界理解这部作品提供了有益的条件。参见闻翔：《从“大众社会”到“社会学的想象力”理解米尔斯的一条内在线索》，《社会》2012年第4期，第1~23页；闻翔：《以“匠人精神”，写“社会学的诗”米尔斯的社会学遗产之重估》，《社会》2016年第6期，第126~154页。
- ② 参见闻翔：《以“匠人精神”，写“社会学的诗”米尔斯的社会学遗产之重估》，《社会》2016年第6期，第138页；赵立玮：《社会学的想象与想象的社会学——帕森斯、米尔斯社会学研究进路比较论要》，《社会》2016年第6期，第97~125页。
- ③ 参见 Robert E. Stauffer, *Sociology and Liberal Education: The Ends We Serve*, *Teaching Sociology*, Vol. 7 (3), 1980, pp. 247-264.
- ④ 参见 Robert E. Stauffer, *Sociology and Liberal Education: The Ends We Serve*, *Teaching Sociology*, Vol. 7 (3), 1980, pp. 249-250。此后，关于米尔斯这方面思想的研究也并不多见。

以及相关的主张，在米尔斯此前的多部作品之中已经有所体现。<sup>①</sup> 在1951年的《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一书中，米尔斯对美国白领之形象气质的刻画所使用的主要要素，就已经是他后来对“想象力之匮乏”状态的描述了：漠然（indifference）、不安（uneasiness）以及没有将自己的困扰与更大的社会和历史结构联系在一起的能力。<sup>②</sup> 除了上述知名作品，1954年，米尔斯还发表过一篇名为《大众社会与通识教育》的文章。<sup>③</sup> 在这篇文章中，米尔斯并没有对当时美国社会中关于通识教育的讨论予以回应，而是直接从对现代社会的分析入手来阐发他对通识教育的理解。这些思考均与他在整个1950年代的思考一以贯之。而在这一基础上提出的通识教育理念，则与他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一书中对社会学的想象力的阐述多有若合符节之处。

在这篇文章中，米尔斯首先区分了“大众”（the mass）和“公众”（the public）这两个概念，并且认为在当时的美国社会之中存在可以代表“公众”的“专家”形象，然而此种“专家”并没有真正进入到公共事务之中，而是以一种“职业化无涉”（professional disinterest）的态度行事，<sup>④</sup> 并且这一现象和趋势有成为“意见经济”（opinion business）的危险。<sup>⑤</sup> 米尔斯将具有共同体色彩的“公众社会”视为现代社会的理想形态，将其对立面的“大众社会”视为现代社会需要加以防范的对象。在总体上，米尔斯认为现代社会存在“大众状态”压倒“公众状态”的趋势，而这是大学教育必须直面的核心问题。<sup>⑥</sup>

在5年之后的《社会学的想象力》一书中，米尔斯在第一章“承诺”里，开篇就如此表明他所处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往往会感受到一种无可逃避的“陷阱感”：“人们往往觉得，自己的私人生活就是一道又一道的陷阱……而支撑着这种陷阱感的，正是全世界各个社会

① 参见闻翔：《从“大众社会”到“社会学的想象力”理解米尔斯的一条内在线索》，《社会》2012年第4期，第1~23页；[美]查尔斯·赖特·米尔斯：《权力精英》，许荣、王崑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82页。

② 参见[美]C. 莱特·米尔斯：《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周晓虹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③ 参见Irring Louis Horowitz, *Power, Politics, and People: The Collected Essays of C. Wright Mill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pp. 353-374。

④ 参见Irring Louis Horowitz, *Power, Politics, and People: The Collected Essays of C. Wright Mill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p. 358。

⑤ 参见Irring Louis Horowitz, *Power, Politics, and People: The Collected Essays of C. Wright Mill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p. 359。

⑥ 参见Irring Louis Horowitz, *Power, Politics, and People: The Collected Essays of C. Wright Mill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p. 359。

的结构本身所发生的那些看似非个人性的变迁。”<sup>①</sup> 米尔斯所说的此种社会变迁及其所带来的“陷阱感”，与他此前在多部作品之中，包括在《大众社会与通识教育》一文中所强调的从“公众社会”向“大众社会”的变迁基本相同。将这一变迁作为米尔斯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一书中的思考前提，可以对其接下来的诸多论述有清晰的理解。

在对于大众社会的分析中，米尔斯尤其强调“大众传媒”现象及其后果。在这方面，米尔斯的论证也和《社会学的想象力》一书中对于“想象力”的界定如出一辙。他明确指出，此种现代性现象之蔓延所带来的“紧张”和“焦虑”，以及与此相关的“无能为力”的感觉：“今日盛行无碍的大众传媒，不仅仅没有作为一种教育的力量，反而成为一种有害的力量——这意味着它并没有向听众揭示其紧张与焦虑的各种来源、那些莫名其妙的怨恨和诸多被塑造的希望之来源……这些大众传媒不能使得个体超越他生活于其间的狭隘环境（the narrow milieu），也不能将他们与在世界上正在发生的更大的现实关联在一起。”<sup>②</sup>

米尔斯从个体在日常生活中的困扰等真实处境入手，以一种白描式的手法解释了缺乏“社会学想象力”的状况。这一描述与前述文字同样强调了个体无法将自己的困扰与更大范围的历史和社会结构联系在一起进行思考的问题：“人们通常不从历史变迁和制度矛盾的角度出发，来界定自己所经历的困扰……普通人很少会意识到，自己生活的模式与世界历史的进程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关联。他们通常并不知道，这种关联如何影响到自己会变成哪种人，如何影响到自己可能参与怎样的历史塑造。”<sup>③</sup>

在《大众社会与通识教育》一文里，米尔斯则从另外一个方向论证了这一点。他认为，“大众传媒”并没有为听众带来此种“社会学的想象力”，恰恰相反，使人们的心灵更为狭隘了。现代巨型社会（metropolitan society）的兴起、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大型公司化等因素共同作用，使人们的生活越来越狭隘化和碎片化，同时越来越失去共同体感。<sup>④</sup> 此种碎片化和狭隘化的生活方式，与大众传媒的影响恰好有着亲和力。所有这些共同造成了现代人之想象力的缺乏，也失去了真正和他人打交道的能力，“每个人都陷入了他

① [美] C. 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李康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1~2 页。

② Irving Louis Horowitz, *Power, Politics, and People: The Collected Essays of C. Wright Mill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p. 363.

③ [美] C. 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李康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1 页。

④ 参见 Irving Louis Horowitz, *Power, Politics, and People: The Collected Essays of C. Wright Mill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p. 365。

自己的禁制圈子 (confining circle)”。<sup>①</sup>

在这样一种现代状态中,“公共”(public)消失了,人们变得无力,失去了“寻求理性、理性决定和行动的意志”,与此同时,“他们孤独而又恐惧”。<sup>②</sup>

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一书中,米尔斯所做的那些在今天看来颇有预言意义的、对于普通人的描写,虽然并未直接提及属于“大众传媒”的影响,然而通过与《大众社会与通识教育》一文的比较可以发现,其内容基本就是在讲大众传媒:在现代社会里,普通人所获得的信息太多,已经超出了个体的吸收能力,但信息却并不是他真正需要的东西。这一状况所代表的现代社会变迁,带来了大众的基本心理状态,也就是失去想象力之人的状态:“漠然”和“不安”。<sup>③</sup>

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两种精神状态,在后文中,米尔斯区分了“‘源于周遭情境的个人困扰’与‘关乎社会结构的公共议题’”之间的不同,并且认为,这种区分“是社会学想象力的基本工具”。<sup>④</sup>

米尔斯的这个区分有两层意思,首先指个人困扰和公共议题是不同的,其次指对公共议题的理解要从个人困扰之中来。后面这一层意思往往被学界忽略。然而,在区分了这二者之后,米尔斯迅即指出,私人困扰在现代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漠然(indifference)与不安(uneasiness),或者与其相应的焦虑(anxiety)。<sup>⑤</sup>由此,这几个概念几乎成为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一书中贯穿全书的核心概念,是在该书之中以“社会学的想象力”这一概念去直面的核心内容。

从“孤独大众”的描述到关于“焦虑”和“不安”的意向并非米尔斯的独创。1950年,大卫·理斯曼(David Riesman)等所著的《孤独的人群:美国人社会性格演变之研究》一书<sup>⑥</sup>对于美国中产阶级性格的分析就以这几

① 参见 Iring Louis Horowitz, *Power, Politics, and People: The Collected Essays of C. Wright Mill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p. 365。

② 参见 Iring Louis Horowitz, *Power, Politics, and People: The Collected Essays of C. Wright Mill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p. 367。

③ 参见 [美] C. 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李康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4、13页。

④ 参见 [美] C. 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李康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8页。

⑤ 参见 [美] C. 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李康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3页。

⑥ 参见 David Riesman, Reuel Denne and Nathan Glazer, *The Lonely Crowd: A Study of the Changing American Characte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0。

个关键词为主要思考线索。这部 1950 年代在欧美社会极具影响力的社会学著作，时至今日，依然是研究当代德国社会“恐惧症”相关作品的参考书目。<sup>①</sup>而对相关心灵状态的关注，实际上从 1937 年卡伦·霍妮对现当代社会的“神经症人格”的分析<sup>②</sup>到 1980 年代艾伦·布卢姆对“美国精神的封闭”的刻画，<sup>③</sup>以及 2018 年格雷格·卢金诺夫等对当代大学生群体“娇惯的心灵”的判断，<sup>④</sup>一直都是美国学界和知识界的讨论热点。然而米尔斯的社会分析与众不同，他并未将重心放在对此种精神状态的分析中，而是直接以其为出发点展开对造成此种精神状态的社会机制的分析。

总体来说，在两个文本中，米尔斯都强调了个体将自己的“困扰”与更大的“现实”和“历史”之间展开“关联”的重要性。两处文本主题不同，论证走向也不同，然而内在逻辑却高度类似。对于米尔斯来说，无论是通识教育，还是社会学的想象力，都意味着可以帮助个人摆脱受困之陷阱感的心智品质。不过，此种“社会学的想象力”之心智品质非常罕见，所以他继续以悲悯之心说：“要把握人与社会、人生与历史、自我与世界之间的相互作用，必须有特定的心智品质，而他们并不具备这样的品质。他们没有能力以特别的方式应对自己的私人困扰，以控制通常隐伏其后的那些结构转型……无法理解所处的时代对于自己生活的意义。”<sup>⑤</sup>

将这一想象力的要求落实在通识教育之上，米尔斯的主张包括个体和群体两个层面。首先，“学院应该将个体的个人困扰和关切转为社会议题和理性上开放的问题……任务是帮助他成为自我教育的人（self-educating man），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他自由”。其次，在群体的层面上，米尔斯认为，学院应该做到“帮助建设和强化一个自我教化（self-cultivating）的自由公众群体，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他们自由”。<sup>⑥</sup>

“自我教育的人”这一目标，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一书中同样是米尔斯认为社会学的想象力最终落实的表现之一。在该书最后一章，米尔斯

① 参见 [德] 海因茨·布德：《焦虑的社会：德国当代的恐惧症》，吴宁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0 年版。

② 参见 [美] 卡伦·霍妮：《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冯川译，译林出版社 2016 年版。

③ 参见 [美] 艾伦·布卢姆：《美国精神的封闭》，战旭英译，译林出版社 2011 年版。

④ 参见 [美] 格雷格·卢金诺夫、乔纳森·海特：《娇惯的心灵：“钢铁”是怎么没有炼成的？》，田雷、苏心译，三联书店 2020 年版。

⑤ [美] C. 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李康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1~2 页。

⑥ 参见 Irving Louis Horowitz, *Power, Politics, and People: The Collected Essays of C. Wright Mill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p. 368。

为“面向议题的社会科学家”赋予一种公共职责：教育，毋宁说通识教育的职责，并就此提出了在“社会学的想象力”视角下的教育目标。他认为，这一目标的实现，是培育“公共社会”的重要路径：“如果他（社会科学家）关注通识（liberal）教育，即解放性的（liberating）教育，他所承担的公共角色就有两大目标。他应当为个体所做的是将私人的困扰和关注转化为社会议题与问题，以接受理性的审视；他的目标就是帮助个体成为自我教育的人，只有到那时，后者才会是自由的、讲求理性的。而他应当为社会做的则是抗御一切逐步毁坏真正的公众而创造一个大众社会的力量。或者，以积极的目标来表述，他的宗旨就是帮助打造并巩固一些自我教化（self-educating）的公众群体。只有到那时，社会才能是自由的、讲求理性的。”<sup>①</sup>

值得注意的是，米尔斯在《大众社会与通识教育》一文中，强调的是“夜校”（evening college）为社区（community）所作的贡献：这一教育的对象是“成人”（adults），而非仅仅青年学生。他希望这一教育能够培养“勇敢和敏锐的个体，这样的人不会被现代生活的重负所压垮”。<sup>②</sup>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一书中，他所强调的也是面向公共的教育。非常明显，不把关于想象力的通识教育局限在象牙塔之内，而是将其非常明确地置于社会之中，将此种教育视为一种针对社会的行动，是米尔斯对于“社会学的想象力”所具有的高度功能性的期待。米尔斯将研究和教学视为一种社会实践。“社会学的想象力”这种心智品质应该不仅仅局限于社会学界，而是要与现代社会中更为广泛的群体相关。虽然名为“社会学的想象力”，然而米尔斯主张这是一种现代人应该普遍具备的心智品质。他说，普通人真正需要的是这样一种心智品质：这种心智品质能够帮助他们“运用信息，发展理性，以求清晰地概括出周边世界正在发生什么，他们自己又会遭遇到什么”。<sup>③</sup>所以，从社会学家到科学家，从公众到媒体编辑等各色人等，都需要具有这样一种心智品质。具有这种心智品质的人，有能力去理解更大的历史景观，并且思考“它对于形形色色的个体的内在生命与外在生涯的意义”。<sup>④</sup>

① [美] C. 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李康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60页。

② 参见 Irving Louis Horowitz, *Power, Politics, and People: The Collected Essays of C. Wright Mill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p. 367。

③ 参见 [美] C. 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李康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4页。

④ 参见 [美] C. 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李康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4页。

最后，在这两个文本中，米尔斯都特别强调了“价值教育”的面向。<sup>①</sup>他认为，这意味着教育要从学生最为切身之处开始，要能够帮助学生逐步获得关于自身困扰的想象力和深入而理性思考的能力，也就是塑造出能够“自我教育”之人。所以对于米尔斯来说，此种教育带有“治疗”的意义——米尔斯甚至强调，教师要拥有“治疗”的技能，<sup>②</sup>而治疗的关键，当然是帮助人们获得想象力：能够将自身的困扰及其解决之道，与其所处的历史和社会结构结合在一起加以考虑。

所以，在《大众社会与通识教育》一文的结尾，米尔斯再度将此种通识教育和社会紧密结合在一起，强调学院教育仅是一个社会的一部分。<sup>③</sup>一个成熟而理性的个体，需要终其一生不停地成长和实践，只有在这一过程中，通识教育的目标才能够实现。

从这两个文本的比较之中，我们可以看到，米尔斯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一书中所做的诸多分析都可以被视为在一个大众社会中面向社会的通识教育。这也正是他将社会学的想象力视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心智品质的意义所在。不过，在这部著作中还存在诸多隐藏的线索，可以帮助我们在更为广泛的社会理论传统中，深入研究米尔斯的通识教育思想。

## 二、社会学的想象力的第一重承诺：直面漠然与不安

### （一）漠然与不安

米尔斯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一书开篇部分就指出：“不安和漠然的境况，就是我们时代的标志性特征。”<sup>④</sup>他这一对于现代社会大众心态的判断由来已久。在1951年的《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一书中，米尔斯已经发现美国社会从传统的公众社会向现代意义上的大众社会过渡的趋势。在

① 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一书中，米尔斯强调，自由和理性堪称西方文化中社会科学的核心价值与承诺，参见 [美] C. 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李康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42页。在该书的最后一章里，米尔斯开篇即主张社会科学本来就隐含了某些固有价值，也应该有其在价值方面的选择，参见 [美] C. 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李康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49~250页；Irring Louis Horowitz, *Power, Politics, and People: The Collected Essays of C. Wright Mill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p. 369。

② 参见 Irring Louis Horowitz, *Power, Politics, and People: The Collected Essays of C. Wright Mill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p. 370。

③ 参见 Irring Louis Horowitz, *Power, Politics, and People: The Collected Essays of C. Wright Mill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p. 373。

④ [美] C. 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李康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4页。



1956年的《权力精英》一书中，米尔斯进一步申明，美国社会的结构基础发生了从“公众社会”向“大众社会”的转变。对这两个概念的比较性理解和使用，一直贯穿米尔斯此后对于美国社会的思考。<sup>①</sup>

米尔斯对于美国白领之形象气质的刻画所使用的要素，就是他在后来对于“想象力之匮乏”状态的描述——而这些状态，都是和“焦虑”“不安”相关的。米尔斯说：“在怀疑和操纵的环境中，与社区和社会的疏离；与工作的异化，以及在人格市场上与自我的异化；个体理性的被剥夺，以及政治上的冷漠——这些就是新的小人物，现代社会迫不得已的前卫人士。”<sup>②</sup>

在上面这个段落以及其他诸多段落中，米尔斯不厌其烦地讨论美国白领的此种生存状态，并且以一种社会学的想象力的框架指出，“要获得更为真实的意识，白领人士必须认识到他们自己是一个新阶层中的一员，而这个新阶层正实践着现代美国一种新的工作和生活方式。要知道如何才能理解自己的问题，他们就必须要在运作着的社会架构中，将他们的兴趣与他们的利益联系起来考虑。”<sup>③</sup>

然而没有能力从自己的困扰之中抽身而出，无法从社会结构和历史的视角来思考自己的问题，也是典型的白领状态。所以在米尔斯看来，《社会学的想象力》一书中所说的“冷漠”、“焦虑”、“不安”和“不适”甚至“恐惧”是在《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一书中对美国中产阶级的描述，同时也完全适用于对美国社会学学者的描述。这就意味着，米尔斯并不认为“焦虑”和“不安”应该是心理学或者精神分析治疗所面对的精神状态，因为此种精神状态的真正来源在于社会结构的转型所造成的人格状态。所以，在《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一书中，米尔斯使用了与涂尔干讲述“失范”这一概念非常类似的句子来描述美国中产阶级的不安和不适——这同时意味着他依然将自己置于经典社会学的问题意识传统和社会学思考范式传统。他说：“我们时代的不安宁和不舒适导源于以下基本事实：在我们的政治和经济中，在我们的家庭生活和宗教中——事实上在我们社会存在的每一个领域中——18世纪和19世纪里不言自明的东西都在崩溃或受到毁灭，与此同时，就我们生活和必须生活于其间的新的秩序而言，又没有形成任何新的道

① 关于米尔斯对这两个概念的使用，参见闻翔：《从“大众社会”到“社会学的想象力”理解米尔斯的一条内在线索》，《社会》2012年第4期，第1~23页。

② [美] C. 莱特·米尔斯：《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周晓虹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0页。

③ [美] C. 莱特·米尔斯：《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周晓虹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1页。

德约束和正当性。”<sup>①</sup>

米尔斯将现代社会的此种变迁状况及其原因描述得淋漓尽致，他说：“白领人士的不适有着深刻的根源：因为缺乏信仰体系，使得他们作为个体在道义上孤立无助，作为群体在政治上软弱无力，在艰难的创新时代里，除了那个塑造了他又企图将他控制在其异化目标之下的大众社会外，白领人士没有任何文化的基础可以依托。”<sup>②</sup>

基于此种认识，米尔斯的社会学想象力所提出的第一重通识教育的承诺，就是直面此种漠然与不安。与这两种私人困扰相关的心态，如焦虑和沮丧等，在当时的社会科学之中尚未成为明确的“社会科学的问题”。即便到了今天，虽然存在相关的研究，然而这些问题也并未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主流。<sup>③</sup> 在中国社会学界，关于此种精神状态的研究也并不多见。米尔斯认为这并不正常，因为在他看来，对于接受理性和自由之类的传统价值的社会科学家来说，“不安本身就是困扰，漠然本身就是议题”。<sup>④</sup>

漠然与不安的精神状态不仅仅是米尔斯研究所关心的主要议题，同样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现代精神气质，在诸多关于高等教育和通识教育的文本之中都有涉及。<sup>⑤</sup> 米尔斯认为，社会学的想象力不仅仅是社会学人所应该具有的心智品质，也是每一个现代社会中的公民必备的心智品质。这一心智品质会改变大众所具有的上述心理状态，<sup>⑥</sup> 然而却并不容易实现，原因在于米尔斯认为社会学研究已经距离此种承诺很远了。他逐一描述和分析当时美国社会学界实现社会学研究的各种形式与实践，抽丝剥茧般地证明了这些研究本身就来自“冷漠”的态度，就是此种“冷漠”的表现，而其研究内容也并不能够触及现实，并因此而无助于人的“不安”。

① [美] C. 莱特·米尔斯：《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周晓虹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5 页。

② [美] C. 莱特·米尔斯：《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周晓虹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5 页。

③ 参见萧易忻：《“抑郁症如何产生”的社会学分析：基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视角》，《社会》2016 年第 2 期，第 194 页。

④ 参见 [美] C. 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李康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14 页。

⑤ 例如艾伦·布卢姆在《美国精神的封闭》一书中、乔纳森·海特在《娇惯的心灵：“钢铁”是怎么没有炼成的？》一书中、卡伦·霍尼在《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一书中和海因茨·布德在《焦虑的社会》一书中，均讲述了现代人的此种生存状态。

⑥ 参见 [美] C. 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李康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4 页。

## (二) 社会学想象力的不足

众所周知,米尔斯是从批评帕森斯的宏大理论开始对社会学的想象力展开具体界定的。从表面上看,米尔斯严厉甚至尖酸刻薄地批评了帕森斯晦涩的文风和令人望而生畏的宏大概念体系。不过更为重要的是,米尔斯认为,此种抽象的大概念讨论,会使得理论研究最终不过是在讨论“传统的所谓‘合法化’”——也就是说,帕森斯的此种宏大理论讨论,最终会落实在对既有社会秩序的合法化论证上,<sup>①</sup>这也是为何米尔斯一再选用帕森斯有关“价值”和“秩序”之主题的段落作为例证的原因。在米尔斯看来,宏大理论的问题就在于,将价值问题转变为道德合法性问题,失去了对于既有权力和社会秩序的批判性视角。也就是说,为既有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的合法性做出辩护。故而此种宏大理论往往意味着保守主义的倾向。也即,米尔斯认为帕森斯所代表的宏大理论工作无法直面现实的挑战。在对于此类问题的讨论中,米尔斯证明了帕森斯的宏大理论的无力感,并由此表明,“无想象力”是隐藏在其论证结构之中的。也就是说,此种对于价值问题的漠然本身就意味着维护既有的秩序和保守的价值观,而这使得帕森斯式的理论无助于甚至有害于想象力。这种类型的社会学工作在理解大众社会的心态上并无任何助益,也即无法触及现实,当然也无助于社会学的承诺。

抽象经验主义和宏大理论一样,“也是抓住研究过程中的某个关节不放,任其支配头脑”,<sup>②</sup>而这样做恰好有害于社会学想象力的实现。在偏向“标准化”的抽象经验主义研究中,不存在对历史和个体心理的重视,并且受制于对方法的认识,以一种不自觉的形式走向了极端:“他们满脑子想的都是方法论上的约束。”<sup>③</sup>米尔斯认为,伯纳德·贝雷尔森(Bernard Berelson)评论舆论研究领域的一段话,几乎可以概括抽象经验主义:“这块领域已经变得技术化、量化、非理论化、条块化、特殊化、专门化、制度化、‘现代化’和‘群体化’,简言之,作为一种别具特色的行为科学,这块领域已经美国化了……今天,技术专家团队针对特定主题实施研究方案并报告结果……它属于科学。”<sup>④</sup>

① 参见[美]C.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李康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49页。

② [美]C.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李康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69页。

③ [美]C.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李康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76页。

④ [美]C.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李康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76页。

这一将自己视为自然科学的态度，是该流派的实质特征。此种抽象经验主义在现代社会科学中愈演愈烈，几乎扩展到社会科学全部的“问题领域”。在这种研究中，“最具决定性的结果就是方法论上的约束……一言以蔽之，方法论似乎决定了问题”。<sup>①</sup>而这必然导致在价值问题上的淡漠和无法触及现实问题的困境。米尔斯认为，这种流派既没有能力发现真正重要的问题，研究由此往往显得单薄贫乏，也不能实现他们自称的“真实”，因为“精确甚或是伪精确与‘真实’”是两回事。<sup>②</sup>换句话说，抽象经验主义并非真正的“经验性”和“科学性”研究。

此种研究对于想象力的伤害在于，研究者对于社会学同样没有清晰的认识，“其中许多人，尤其是年轻一些的人，并不很熟悉认识论，有鉴于此，他们往往会支配他们的那套典范抱持相当教条的态度。”<sup>③</sup>所以这一类研究流派和宏大理论一样，都“缺乏与实质问题的牢固关联”，<sup>④</sup>对于“淡漠”和“不安”的问题都无法做出真正的回应。

如果说上述两个流派还有某些方面的真诚，并因此而掩盖了研究者的价值观和对现实世界的“介入”或“触及”，那么在此之后，米尔斯通过对更具体和实际的社会学研究取向——也即各种实用取向——的批评表明，仅仅与现实的关联同样无法保证社会学的想象力。米尔斯认为，各种与科层制度有关的实用取向，必然具有意识形态的意味。这一点不太容易为人所理解，因为美国的社会科学与改革思潮和社会进步运动有着直接关系，通常被认为是“‘运用科学’来研究社会问题”的表现。<sup>⑤</sup>在这其中，自由主义被认为是一个“共同尺度”，是社会科学作为一门中产阶级学问的核心价值观。但是米尔斯把这种自由主义实用取向视为“一种道德化的情境社会学”，<sup>⑥</sup>其中对于人的假设并非普遍性的，而是某种特定道德

① [美] C. 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李康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79 页。

② 参见 [美] C. 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李康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101 页。

③ [美] C. 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李康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104 页。

④ 参见 [美] C. 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李康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104 页；Jacques Barzun and Henry F. Graff, *The Modern Researcher*,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 1957。

⑤ 参见 [美] C. 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李康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118 页。

⑥ 参见 [美] C. 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李康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123 页。

价值的体现，也就是“美国小城镇里的中产阶级”所具有的价值观。<sup>①</sup>而其他新的实用主义取向往往比上述取向更加直白地依附于意识形态。米尔斯认为，其中的研究没有任何真材实料，<sup>②</sup>也因此并不是真正的社会学研究。

至于当时美国新出现的一种影响更大的社会学研究用途——“管理型、操控型保守主义用途”，米尔斯认为，这是一种以抽象经验主义的方式展开的“非自由主义新型实用取向”，其发展在现代社会越来越猛烈，堪称“影响整个人文学科的总体趋势”，并且最终会在学界和学术研究之中造就一种科层制气质（Bureau ethos）。<sup>③</sup>

科层制气质意味着，大学被视为一种“从事研究的科层组织，各自包含一组精详的分工，因此也就各自容纳一群知识技术专家”。<sup>④</sup>对于这些身处知识科层制度之中的人尤其是年轻人来说，米尔斯所看到的是最为典型的社会学想象力的缺乏。米尔斯说：“他们选择社会研究作为职业生涯，早早进入非常狭隘的专业分工，并对所谓‘社会哲学’养成了一种漠然乃至蔑视，认为它意味着‘从其他书本里攒出书来’，或‘无非是些玄思妙想’。听听他们彼此之间的交谈，试试掂量一下他们那份好奇的品质，你会发现其心智的局限简直要命。”<sup>⑤</sup>

如果说“漠然”和“不安”是社会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那么此种人群——包括此前所说的宏大理论、抽象经验主义和各种实用主义的研究者们——及其在“漠然”态度下的研究，不仅没有办法直面此种研究主题，显然其本身也应该是被研究的对象。在现代科层制度下培养起来的青年学者们，在这一种学术制度之中所学到的内容，以及由此而培养起来的心智，是漠然而没有社会学想象力的。米尔斯说：“一旦一位年轻人在这种事情上耗了三四年光景，你其实无法和他讨论有关如何研究现代社会的问题。他的立场和职业生涯、他的野心和那份自尊，在很大程度上就只是基于这一种视角，这一组词汇，这一套技术。说实话，除此之外，他一无

① 参见 [美] C. 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李康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127 页。

② 参见 [美] C. 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李康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138 页。

③ 参见 [美] C. 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李康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139 页。

④ [美] C. 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李康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143 页。

⑤ [美] C. 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李康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146 页。

所知。”<sup>①</sup>

原因在于，这些人做研究的目的和意义并非在研究本身，而是为了把自己“成功推销开去”。他们没有任何人文素养和对人类理性的尊重，而是“属于充满干劲、野心勃勃的技术专家，教育成规有缺陷，所怀需求也令人败坏，哲学都使得他们无法养成社会学的想象力”。<sup>②</sup>

在《大众社会与通识教育》一文中，米尔斯从教育的角度出发对现代社会的理解所提出的第一个现代社会向大众社会发展的危险表征，就是科层主义结构（bureaucratic structures）的兴起。<sup>③</sup> 所以他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一书中所列举的学界的科层主义状况，实际上是整个社会的缩影。

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一“兴起”之中，米尔斯感到了个人生活在现代社会之中的消逝带来的危险——而这正是前述个人困扰及其相关的“焦虑”和“不安”的结构背景。他敏锐觉察到了个人困扰乃至其所代表的重大社会议题开始被现代社会职业化的社会结构所吞噬的危险。具体来说，就是上述个人困扰往往会被视为“精神疾病”而被归于“精神病学”的关心范畴。这种关于人的知识的理性化既无法直面真正关于人类苦难的事实，其本身也正是“不安”和“漠然”的表现。米尔斯认为，“不安”和“漠然”的大众心态实际上代表了更大范围内的社会风气和制度问题，或是一种社会和历史的问题，不能仅仅从个体层面或者关于精神问题的专业研究领域出发来展开研究。<sup>④</sup> 然而私人生活一旦仅仅被归为私人生活，被视为只与某一种类型的职业工作相关，那么也就切断了社会科学理解现代社会的可能性了。米尔斯借用弗洛伊德著名的弟子恩斯特·琼斯（Ernest Jones）的话，认为现代社会之中，“‘人的主要危险’在于当代社会本身桀骜难驯的力量，以及其令人异化的生产方式、严丝合缝的政治支配技术、国际范围内的无政府状态等等”，换句话说，此种漠然和不安的状态，实际上是现代社会对“人的

① [美] C. 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李康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147 页。

② 参见 [美] C. 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李康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147 页。

③ 参见 Irving Louis Horowitz, *Power, Politics, and People: The Collected Essays of C. Wright Mill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p. 360.

④ 事实上，将社会心态越来越理解为某种医学专业知识才能够面对的特殊事实，也正是目前国内大量关于社会心态研究的一个明显特征。在诸多研究中，李晓光和吴晓刚的关于新冠疫情下的不同性别和社会阶层群体所具有的心理健康差异研究，是较为少见的将对于“心态”的理解置于社会结构与历史背景之下的实证研究。参见李晓光、吴晓刚：《同城异郁：新冠疫情下的性别、阶层与心理健康差异》，《人口与发展》2021 年第 6 期，第 95 ~ 105 页。

生活的境况与目标所进行的普遍渗透的改造”所导致的,<sup>①</sup>是被建构起来的。最后,从研究的角度来说,在需要越来越多的人共同参与的现当代社会科学中,研究者本来可能以“集体性的方式”来实现对研究手段的完整控制,以求实现社会科学研究的真正独立自主,然而米尔斯强调,一旦涉及集体,那么“学院派系”就成为一个学术界的客观事实。派系会影响到“据以评判人物、批评工作的那些标准”。<sup>②</sup>然而这往往沦为与学院政治和权力斗争息息相关的产物,与研究本身越来越远——最终无关乎真正的和严肃的学术研究。

以上种种对于当时美国学界的“白描式”记录与批评,哪怕在70多年之后的中国学者读来也并不陌生。米尔斯所做的正是从他自身在日常生活之中的困惑出发的研究。只不过他的个人困扰恰好和社会学有关:什么是社会学?社会学的研究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所以在对于各种科学哲学的讨论中,米尔斯将对于社会学的想象力的界定再度推进了一步。在前述对抽象经验主义和科层气质之批判的前提下,米尔斯认为研究必须从个人的困扰出发,并将其与社会结构结合在一起。而《社会学的想象力》就是要为社会学研究标定一个“榜样”。

由于社会之中普遍弥漫着此种焦虑和漠然的心态,所以社会科学家同时在政治上和学术上的“首要任务,就是厘清当代的不安与漠然都包括哪些成分”。<sup>③</sup>这是现当代社会之中整个学术共同体都要面对的首要问题,也正因如此,能够提供社会学想象力及其操作的“社会科学将日渐成为我们这个文化时代的共同尺度,而社会学的想象力也将愈益成为我们最需要的心智品质(quality of mind)”。<sup>④</sup>这是真正的社会学对现代社会的第一重承诺。

### 三、社会学的想象力的第二重承诺:理性与自由

此种“心智品质”意味着什么?社会学的想象力要求研究回到人本身,将人视为一种社会性和历史性的存在。这是回到人本身最基本的要求。然而

① 参见[美]C.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李康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6页。

② 参见[美]C.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李康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49页。

③ 参见[美]C.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李康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6页。

④ 参见[美]C.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李康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6页。

很不幸，现代社会的大趋势所影响的不仅仅是社会科学，“也是美国整个的思想生活，实际上还影响到了理性在今日世间人事中所扮演的角色本身”。<sup>①</sup>所以重新打开社会学的想象力，首先带来的意义在于，重新在知识工作之中为社会打开真正的理性形式，以及由此带来的自由之可能性。

在《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一书中，米尔斯同样强调理性与自由，并将其视为经典社会理论中的强大维度。然而他也清晰地看到，在现代社会里，作为主流的中产阶级，包括大学里的研究者们，面对的是一种以“科层制度”和各种社会机构为代表的理性形式，“白领们则不过是将社会捆绑在一起的巨大的权威链条上的可替换的一环”。<sup>②</sup>

这一理解同样与米尔斯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一书中的观点相贯通。通过对欧洲近现代思想史的梳理，米尔斯认为，理性与自由的宣称贯穿于整个现代性思潮之中——无论哪一种思潮都是如此，而“理性在世间人事里的角色、自由个体作为理性载体的观念，正是20世纪社会科学家从启蒙运动哲人那里继承下来的最重要的主题”<sup>③</sup>——也就是社会科学的实质。然而这一社会科学最初的实质，在传播到美国社会之后，因应着美国社会的具体情势，发生了诸多变迁。在1930年代之前，社会科学之中就已经出现了“科学主义潮流”，而社会科学作为一种职业也趋于稳定。<sup>④</sup>到了米尔斯所在的1950年代，此种以科学领域之中的专业工作来取代现实行动的情况越来越普遍，社会科学作为一种职业越来越稳固，然而，“自由和理性的理念重新变得存有争议了，合理性的增长或许并不一定能够促进自由的增长”。<sup>⑤</sup>社会的理性化并未促进个人实质理性的发展，恰恰相反。米尔斯特别强调，此种社会趋势只是带来了如下这种类型的人：“‘有’合理性，却没有理性；越来越自我合理化，却也越来越焦虑不安”。<sup>⑥</sup>韦伯的核心议题再次被提出：作为历史命运的理性化和作为个体的理性化（追求自由）之间的张力，变

① [美] C. 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李康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48页。

② 参见 [美] C. 莱特·米尔斯：《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周晓虹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9页。

③ 参见 [美] C. 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李康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34页。

④ 参见王楠：《美国社会科学的传统与危机——评多萝西·罗斯的〈美国社会科学的起源〉》，《清华社会科学》2019年第1期，第299页；赵立玮：《社会学的想象与想象的社会学——帕森斯、米尔斯社会学研究进路比较论要》，《社会》2016年第6期，第98~100页。

⑤ [美] C. 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李康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34页。

⑥ [美] C. 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李康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36页。



得越来越具体。这一点会导致人的焦虑不安的合理化越来越成为每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之中的可见命运，并会最终导致集体的非理性。米尔斯说：“在到达极致的发展中，随着合理性甚嚣尘上，随着合理性的落脚点和控制权从个体移到大型组织，绝大多数人获得理智的机会都被破坏了，这么说并非夸大其词。如此一来，就出现了没有理性的合理性（rationality without reason）。这样的合理性不会与自由共进退，而是自由的毁灭者”。<sup>①</sup>

米尔斯以“快活的机器人”（the cheerful robot）来描述此种异化状态下的人。这一描述与马尔库塞许多作品中的描述非常类似，也是在社会理论的历史之中诸多学者直接面对和力图解决的问题。作为这些议题的代表，“不安”和“漠然”这两个核心主题再度出现，却不再只是作为一种大众心态，更成为启蒙以后整个西方世界的核心困扰在现时代的具体体现。也即，此种异化状态带来的一个典型表现，是以“不安”为代表的大众心态和现代性议题的缺乏：“漠然”的人们不再具有提出明确议题的能力——“这是今日自由就其政治背景而言所面临问题的主要部分，也是梳理自由问题向当代社会科学家提出的思想挑战的主要内容”。<sup>②</sup>

所以，具体到个体层面上，虽然自由和理性堪称西方社会科学的核心价值与承诺，<sup>③</sup>然而如上所述，现代社会中存在一个两难的问题，“并非人人都发乎自然地想要自由，并非所有人都愿意尽全力或能够尽全力获取自由所必需的理性。”<sup>④</sup>恰恰是在这种意义上，将“自由”和“理性”视为核心价值的社会科学，就成为针对所有人的、与人的“解放”有关的一种现代意义上的修行，并因此与日益职业化和专业化的美国社会科学格格不入。也正是因此，《社会学的想象力》的最后一章从学术讲到了“政治”。<sup>⑤</sup>

① [美] C. 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李康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38页。

② 参见[美] C. 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李康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41页。

③ 参见[美] C. 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李康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42页。

④ [美] C. 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李康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44页。

⑤ 正如赵立玮所说，该书在实质上表达的是作为一个“激进左派”的“米尔斯的‘政治’纲领”。参见赵立玮：《社会学的想象与想象的社会学 帕森斯、米尔斯社会学研究进路比较论要》，《社会》2016年第6期，第113页。不过，本文并不同意赵立玮的“他所谓的‘社会学想象’不过是用来推进其政治诉求的‘工具’而已”这一判断，而是认为，“社会学的想象力”是米尔斯将社会学视为一种现代意义上的通识教育的基本可能性所在——当然，我们也要为此对这种“通识教育”做出新的界定。

然而如何才能实现这一“心智品质”？在“历史的运用”一章里，米尔斯把“理解人”集中在理解人的“心理”方面。这并不是说米尔斯重视心理学，恰恰相反，他认为当时的心理学已经由于过度专业分工而变得“十分零碎”了。米尔斯特别以并不属于心理学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工作作为例证，认为“在精神分析中，尤其是在弗洛伊德本人的研究中，有关人性本质的问题得到了最为广泛的探讨”。<sup>①</sup> 弗洛伊德工作的有价值之处在于，超越了个体的生理学，而将人的病症、梦等放置于家庭和以超我为代表的社会层面上。<sup>②</sup>

弗洛伊德的例证表明，紧密结合社会现实是理解个体性质的必由之路；而紧密结合个人的生命史，以及此种生命史在其间所展开的制度，则是另外一条研究展开的必然道路。所以如果把想象力视为一种心智品质，那么此种心智品质也必须在一定的训练之后才能够实现，而非简单地去想象。

米尔斯自己也承认，他实际上是借用心理学的术语来展开研究。因为他认为，他所处时代的一个重大课题就在于理解前述社会和政治结构是如何使得个体异化的，所以现代社会的社会学学者首先应该在“时代潮流之中”和在“同属一个社会阶层的其他人的生活机遇之中”，去理解“自己的经验或测定自己的命运”。<sup>③</sup> 社会学学者首先应该自我理解，并以其结论理解现代社会。也就是说，他们的工作必须首先从他们“如何把握自己生活其间的那个时代”出发：判断一位社会学学者的工作是否经典，就看其如何关注“所处时代的显著特征，以及历史如何在其中被塑造出来的问题”，看其如何把握“人性的本质”。<sup>④</sup>

然而这一点是不够的。对应着人的异化，米尔斯担心想象力的单维度化或者匮乏，主张研究要承认和认识人的多样性，要将“历史现实的层面”及其对人的意义紧密关联在一起。<sup>⑤</sup> 对应研究的科层化，他则强调在研究中研究者应该从问题出发，不必特别重视学科边界，“应当专业化的是这类重

① 参见 [美] C. 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李康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222 页。

② 参见 [美] C. 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李康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222 ~ 223 页。

③ 参见 [美] C. 莱特·米尔斯：《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周晓虹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11 页。

④ 参见 [美] C. 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李康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230 页。

⑤ 参见 [美] C. 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李康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186 页。

点关注的‘问题’”。<sup>①</sup>

米尔斯对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历史性非常重视。他认为，“社会科学本身就属于历史学科”，<sup>②</sup> 历史学和社会学之间具有亲密的关系。这也是米尔斯借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工作来讨论“人性本质”的另外一个原因：弗洛伊德明确将人的生命史及其与社会、文明之交织的经验，视为解释人的当下生存的实质维度以及预测未来发展的重要依据。

所以，弗洛伊德的例子还表明，米尔斯一方面希望研究本身要将历史和社会的维度纳入对人的理解之中，另一方面则希望此种具有想象力的社会学研究本身真正具有“疗治”现实的作用。而此种想象力的实现，本身就充盈着“理性”和“自由”的要素。所以在《社会学的想象力》这本著作中，从“理性与自由”这一章开始，米尔斯的视角开始超越研究本身，关注普遍意义上的现代公民。<sup>③</sup>

行文至最后一章，米尔斯强调，社会科学并非真正具有中立性，而是从一开始就隐含了某些固有的价值。米尔斯区分了三种此类价值，首先是“真实的价值，事实的价值”，其次是“理性在世间人事中所扮演的角色的价值”，最后是“人的自由”。<sup>④</sup> 与此相应，社会科学家也有三类角色，即古典哲人王，国王的顾问与独立自由、自主选择议题和面向议题的社会科学家。米尔斯给第三类角色赋予了一种公共职责，也就是教育，或者毋宁说通识教育的职责。他的承诺也就是前述的通识教育，或者说“解放性的（liberating）”教育，在个体和群体层面上，将私人的困扰和关注转化为社会议题与问题，帮助个体成为自我教育的人，帮助社会打造自我教化的公众群体，以求在两种层面上都实现自由与理性。<sup>⑤</sup>

所以在该书的最后，米尔斯号召，社会科学的研究要将注意力投向“议题和困扰，将它们作为社会科学的问题来梳理”，米尔斯认为，这是最好的，

---

① 参见 [美] C. 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李康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198 页。

② [美] C. 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李康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203 页。

③ 正如赵立玮在其研究中敏锐观察到的，米尔斯在其社会学的承诺之中只有“理性与自由”而没有“进步”。在其对于历史的强调和相关叙事之中，米尔斯清晰地体现出了一种“鲜明的浪漫主义怀旧色彩……浪漫主义的乌托邦”。参见赵立玮：《社会学的想象与想象的社会学 帕森斯、米尔斯社会学研究进路比较论要》，《社会》2016 年第 6 期，第 120 页。

④ 参见 [美] C. 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李康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249~250 页。

⑤ 参见 [美] C. 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李康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260 页。

孙飞宇：社会学对通识教育的承诺：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中的三个面向

也是“唯一的机会”，“能让理性以民主的方式在自由社会中与世间人事紧密相关，并由此实现支撑着我们研究承诺的那些经典价值。”<sup>①</sup> 而此前他所批评的各种风格的社会学研究取向，都无法实现这一点，即无法为社会科学家“带来一种解放性的教育角色”。<sup>②</sup>

#### 四、社会学的想象力的第三重承诺：天职观

然而，我们对该书的理解还需再进一步。作为《马克斯·韦伯社会学文集》的翻译者之一，米尔斯受到韦伯的影响非常深入。<sup>③</sup> 这方面的学术研究也颇为多见。<sup>④</sup> 不过，甚少有学者注意到，天职观或许是米尔斯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一书中最重要的一個面向。韦伯在这方面对米尔斯的影响首先体现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一书的思考结构方面：该书的写作和思考结构非常类似于韦伯在名为《科学作为天职》的演讲中的结构。

米尔斯写作《社会学的想象力》这本书的目的，“是要界定社会科学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使命所具有的意义”。<sup>⑤</sup> 要实现这一目的非常艰难，因为米尔斯认为，在他那个时代的社会科学研究中，鲜有能够体现出这一

① [美] C. 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李康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271 页。

② 参见 [美] C. 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李康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264 页。

③ 参见 [德] 汉斯·格特、[美] C. 赖特·米尔斯主编：《马克斯·韦伯社会学文集》，阎克文译，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版。在该书中，格特、米尔斯写的《导读：韦伯其人其作》这篇导读在介绍韦伯时强调的“我们必须从私人境遇和公共事件两个角度去理解他的政治立场，而他的政治立场构成了一个与韦伯其人及其思想根本难分难解的主题”（参见该书第 33 页），基本可以看作社会学之想象力的运用，而“他是一个政治人，又是一个政治知识分子”（参见该书第 33 页）的判断，则基本可以同样看作米尔斯的自我期许。在这篇导读之中强调的韦伯思想中的诸多面向，如对“作出决定并承担道德责任的个人”的强调（参见该书第 71 页）及对“人文主义者的没落和专家的支配地位”的判断（参见该书第 75 页），都在米尔斯后来关于“社会学的想象力”的诸多论述中得到了体现。

④ 参见 Donald A. Nielsen, Hans H. Gerth, C. Wright Mills, and the Legacy of Max Weber,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tics, Culture, and Society*, Vol. 13 (4), 2000, pp. 649 - 661; G. B. Sharp, Mills and Weber: Formalism and the Analysis of Social Structure, *Science and Society*, Vol. 24 (2), 1960, pp. 113 - 133; Guy Oakes and Arthur J. Vidich, Gerth, Mills, and Shils: The Origins of *From Max Weber*,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tics, Culture, and Society*, Vol. 12 (3), 1999, pp. 399 - 433.

⑤ [美] C. 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李康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23 页。

意义的具体形式。所以该书的结构非常奇特，在第一章“承诺”之后，米尔斯花费全书将近一半的篇幅（第二章到第六章）展开了一系列否定性讨论，也就是批驳当时美国社会科学中存在的各种主要研究趋势、对于人的理解倾向以及他所期待的社会学在现实之中落实的重重障碍。米尔斯明确表示，所有这些都并非社会学想象力的表达。所以从结构上来看，在“承诺”之后，该书前半部分都在以否定性的方式来叙述什么不是“社会学的想象力”或者社会科学的使命。然而在现实中，这些社会学实现的样式占据了几乎所有社会学研究的具体类型，科层制度和利益之争也越来越成为决定研究价值和意义的现实原则。所以在这些驳斥中，米尔斯似乎是在表明：真正希望能够承担时代使命的研究者，很难在现实之中展开有意义的社会学研究。

众所周知，韦伯在对慕尼黑的青年学生们的演讲中，首先就是一记当头棒喝：学术研究在生计、事业发展、成果获得和意义给予等若干方面，对于青年学者来说都是否定性的。在演讲开篇，韦伯以白描的手法，比较了德国和美国的青年学者们在开始学术研究生涯之时面临的不同困境，并在此后迅速将二者面临的共同残酷命运提点了出来：资本主义。在资本主义为其主要特征的现代社会中，大学正经历着深刻的变迁。以此为背景，在以理性化为其基本特征的变迁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大学官僚制度中，一个青年学者的职业命运是“纯属运气”，在很大程度上是非理性的。科学的现代内在困境就在于：表面上看，在科学领域取得真正成就只能依靠严格的科学化，然而只有专业化的努力是不够的。韦伯强调，一名学者在此种高度专业化的工作之中，也必须有着迷狂的投入，即非理性的激情投入，才可能获得科学研究中的发现。

一名学者只有接受此种理性与非理性之结合的命运，真正“全心全意”为科学服务，才堪称具有与科学相称的“人格”。从事科学不是为了获得什么别的东西，哪怕是“永恒”也不足以构成从事科学的充分理由。不过，韦伯冷峻的话语还要再进一步：科学本身的命运，“注定处于进步的过程”。<sup>①</sup>换句话说，科学也无法给予其研究者以真正的意义。这就意味着，研究者必须要对科学有着无所求的付出，并且在政治的意义上成熟起来。在《政治作为天职》的演讲中，韦伯将此种要求推广到了每一个现代人那里。对于韦伯来说，这恰恰就是政治之所在，也是每一个现代人之为真正的现代人的要求。

40年之后，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一书中，从理论到经验研究，从实

<sup>①</sup> [德] 马克斯·韦伯：《科学作为天职》，李康译，李猛编：《科学作为天职：韦伯与我们时代的命运》，三联书店2018年版，第17页。

用主义取向到学术的科层制度，米尔斯同样层层展开，逐一否定了现实中展开学术研究的可能性。我们甚至可以说，从第五章“科层制气质”开始，这本书就逐渐成为韦伯《科学作为天职》的美国版本。正如韦伯在其演讲中所做的那样，首先，米尔斯以白描的手法，列举了在美国从事社会学研究的种种不可能和困难，将“事实”摆给读者。虽然没有明言，但对美国社会学界的社会学研究来说，就是在以否定性的写作手法告诉青年学生们，如果要从真正具有社会学想象力的研究，就要在认清了这一系列的否定性现实之后，再做出决断。只有在如此“清明”的态度之中所做出的决定，才堪称实现了从事社会学研究的“天职”。

其次，面对新的历史情境和不同的社会与政治状况，米尔斯提出的此种想象力的“清明”要求不在于任何一种现实的“所求”，而在于和“诸神之争”有关的决断：“个体若想理解自己的体验，估测自己的命运，就必须将自己定位到所处的时代。”<sup>①</sup>然而大多数人都没有这种社会学这种能力。在深受弗洛伊德影响的米尔斯看来，所谓社会学的想象力，并非自由想象的能力，因为“在精神生活中不存在随意性”。<sup>②</sup>并不是说某位读者在阅读《社会学的想象力》以后，记住了甚至理解了“社会学的想象力”这个概念，就能够具有这种能力。这正是社会学的想象力是一种“心智品质”的意思：心智品质是一种经过长期艰苦训练才能够具有的人的精神气质，<sup>③</sup>是一种在日常生活中的韦伯式决断与行动能力，这与自由想象的意思恰好相反。

在其演讲中，韦伯将禁欲主义延伸到科学与教学的领域，认为对于一名学者来说，这恰恰是责任感的体现，本身就是一种道德行为：“一位成功地做到这一点的教师，是在为‘道德’力量服务，担负了创造清明与责任感的义务。”<sup>④</sup>

① [美] C. 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李康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4页。

② 参见 Sigmund Freud, Analysis of a Phobia in a Five-Year-Old Boy, in James Strachey and Anna Freud, eds., *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London: Hogarth Press, 1955, p. 102.

③ 例如，韦伯将诸神之争视为现代社会的命运。任何一名学者都必须在诸多立场之中做出一个决断。然而这并非一件易事。韦伯在演讲中提醒年轻人注意以“先知”名义出现的个人卡里斯玛，因为在具体的学术日常工作中，他会以“学术贵族”（也就是后来米尔斯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一书中所说的“学术大佬”。参见 [美] C. 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李康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49页）等形式出现，对个体的“决断”形成挑战。

④ [德] 马克斯·韦伯：《科学作为天职》，李康译，李猛编：《科学作为天职：韦伯与我们时代的命运》，三联书店2018年版，第40页。

在米尔斯这里，这一“清明”与“责任感”意味着，社会学的想象力使得拥有此种能力的人可以“有能力把握历史，把握人生，也把握这两者在社会当中的关联。这就是社会学的想象力的任务和承诺”。<sup>①</sup>他认为，经典社会学就是以此种想象力为其标志的。按照这一标准，真正的社会学研究应该都会“回到有关人生、历史以及两者在社会中的相互关联的问题”。<sup>②</sup>这意味着有能力从一种视角转换到另外一种视角，意味着人们能够“深刻认识社会的相互依存性，认识到历史的转型力量”。<sup>③</sup>

最后，在该书中存在与在《科学作为天职》的演讲中，韦伯所强调的作为一种“当下行动”的天职观非常类似的对社会学的理解和期待。众所周知，“天职观”这一概念及其意涵来自韦伯对新教伦理及其与早期资本主义精神之亲和力的研究。在这一研究中，韦伯也曾对此种“天职观”在后世的辗转流变之中所出现的专业化和理性化后果有着著名的警惕性预言。不过，在《科学作为天职》的演讲中，作为一种“当下之行动”的天职，却是在“无意义”之现代性绝境中“以行动化解紧张”的最重要内容。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米尔斯作为一种行动的社会学的观点才具有了真正的通识教育色彩：米尔斯所主张的，正是要以“天职”的态度去践行此种在现代社会几乎无法实现的社会学，面向大众社会，以自己的行动来完成教育，而拒绝将其视为某一种学院流派，更非仅仅是某种专业研究。在关于米尔斯的研究历史中，学者们也都注意到了米尔斯对于社会学作为一种行动的强调。<sup>④</sup>结合米尔斯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一书中的种种否定性讨论，我们可以看到，在该书前几章中的种种讨论，同样是构成社会学的想象力的重要面向，是米尔斯版本的“祛魅”和在知识上的“禁欲主义”，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社会学天职。这也正是米尔斯所理解的社会学和这种社会学被视为“公共社会学”之先驱的原因。<sup>⑤</sup>只有在此基础上，《社会学的想象力》一书的前述两重承诺才会真正成为可能，米尔斯的主张与其他通识教育“专业研究领域”的研究或关于通识教育的主张之间才有着真正意义上的区别。

① 参见 [美] C. 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李康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5 页。

② 参见 [美] C. 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李康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6 页。

③ 参见 [美] C. 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李康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7~8 页。

④ 参见闻翔：《从“大众社会”到“社会学的想象力”理解米尔斯的一条内在线索》，《社会》2012 年第 4 期，第 1~23 页。

⑤ 参见 [美] 麦克·布洛维：《公共社会学：麦克·布洛维论文精选》，沈原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 年版。

## 五、社会学对通识教育的承诺

在教育学界，研究型大学之中作为一种职业的研究工作与育人之间的张力问题，是在几乎所有现代大学变得越来越专业化和职业化之后面临的重要问题，甚至是核心问题。<sup>①</sup> 在这方面，社会学可以给出自己的承诺，国内的社会学界也已经做出了有益的尝试和探索，积累了相当的经验。<sup>②</sup> 在西方学界，早在1963年，比尔施泰特（R. Bierstedt）就在《社会学与通识教育》一文中提出了社会学可以对通识教育有所帮助的诸多方面，<sup>③</sup> 此后关于这一领域的讨论也并不鲜见。

然而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一书中，米尔斯主张把拥有想象力的社会学教学作为一种通识教育的实践。在这个意义上，米尔斯不仅是一位美国“激进左派”的代表性人物，更是启蒙运动的真正继承者，他对于此类具有想象力之社会科学家的界定，清晰体现出了康德在《什么是启蒙》这篇宣言中所做的著名判断，将致力于教育出“自我教育的人”的社会学视为启蒙运动意义上的实践：“坚持不懈地将个人困扰转译为公共议题，并针对形形色色的个体，将公共议题转译成人文意涵的表达，这就是社会科学家的政治任务，也是所有通识教育者的政治任务。不仅在他的工作中，而且作为一名教育者，也在自己的生命中展示出这样一种社会学的想象力，这就是他的任务。”<sup>④</sup>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米尔斯所主张的通识教育不是给出一系列课程，或者说为学生提供“通才”的教育。确切地说，米尔斯所理解的通识教育是一种社会学的行动，表面上看来，并不涉及潘光旦先生所说的“通专之辩”，<sup>⑤</sup> 在“育人”的内容上也大异其趣。<sup>⑥</sup> 这既为绵延至今的关于“通识

① 参见李猛：《在研究和教育之间：美国研究型大学兴起的本科学院问题》，《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7年第4期，第2~22页；渠敬东：《“经典”与“经验”的科学：本科教育的精神》，《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7年第4期，第23~37页。

② 参见孙飞宇：《教育职业化趋势中的传统与传承：一项关于北京大学社会学的个案研究》，《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8年第2期，第2~14页。

③ 参见 Robert Bierstedt, *Sociology and Human Learning*, in Charles H. Page, ed., *Sociology and Contemporary Educati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4, pp. 40-56.

④ [美] C. 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李康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62页。

⑤ 参见潘乃穆、潘乃和编：《潘光旦文集》第10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72~375页。

⑥ 参见潘乃穆、潘乃和编：《潘光旦文集》第9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28~540页。



教育为何”的问题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也为社会学的专业研究提出了具有“公民培养”意义的更高要求。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一书的“附论：论治学之道”中，米尔斯首先将社会科学视为一种“手艺的修习”（practice of a craft）。所谓手艺，就是说社会科学的研究不能仅仅是一种标准化的、与个体生活无关的工作，而是一种对于个人化和工作情景有着高度要求的工作。所以米尔斯说，经典的社会学家们从来“没有把自己的工作与生活割裂”，因为“投身学术，既是选择一种职业生涯，也是选择一种生活方式”。<sup>①</sup> 我们可以在中文的语境里将其理解成一种修身治学之道，正如米尔斯所说：“当（一名学者）努力完善其治学之道时，他也在塑造其自我；他落实自己的潜能，把握遇到的任何机会，筑造一种品格，其核心就是好的学者所具备的品质。”<sup>②</sup> 米尔斯进一步强调，这种说法的意思就是“必须在学术工作中学会运用你的生命体验，并坚持不懈地加以审视和解释”。<sup>③</sup> 在该书一开始所说的个人困扰就是此处的“生命体验”，米尔斯说，“说你能‘吸取经验’，首先意味着你的过去会融入并影响你的现在，而这又界定了你吸取未来体验的能力”，所以一名具有想象力的社会科学家，“必须控制这种颇为微妙的相互影响，捕捉你的体验并细加梳理。只有这样，你才能指望用它来指引并检验你的思考，并在这个过程中把自己塑造成一名治学有道的人”。<sup>④</sup> 当然，这需要对自己的体验密切观察和仔细反思，“既要能够信任，同时又要持有疑虑，这是成熟的治学者的一个标志”，这意味着一种“自省”的习惯。<sup>⑤</sup>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作为行动的社会学成为一种在现代社会面向普遍大众的、具有通识教育意义色彩的学科。这种学科既不能简单地被理论化、抽象科学化，也不能简单地被科层化或制度化，而所有在其中舞弄权力和谋取私利的人都无法理解这门学科的真谛。学术工作与私人生活、尽职的投入与对自由和解放的诉求在这个学科中都密不可分。所以在米尔斯看来，现代人由此而成熟，社会学的想象力就好像是卢梭在爱弥尔身上所期待的自然教育

① 参见 [美] C. 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李康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273 页。

② [美] C. 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李康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273 页。

③ [美] C. 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李康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273 页。

④ 参见 [美] C. 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李康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274 页。

⑤ 参见 [美] C. 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李康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275 页。

孙飞宇：社会学对通识教育的承诺：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中的三个面向

---

和公民教育合二为一的那种教育一样，是米尔斯对现代社会何以为好的社会、现代人何以为现代人的理解。他对社会学的理解，同时也是他对大学教育的诉求。在最后两章中，米尔斯把社会学研究视为一种公共行动，社会学的想象力不仅包括此前所说的将个人体验与“社会结构”和“历史”结合在一起，还包括对自由和理性的承诺以及在政治、社会之中的行动：社会学的想象力是一种行动。

总而言之，《社会学的想象力》作为米尔斯对于现代社会科学研究的期待和对于教育的承诺，有着一种奇异的结构，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韦伯的《科学作为天职》之演讲的美国版本或者说现代版本，同样也吸收了涂尔干等经典社会学家对于社会学的基本观点。米尔斯认为，真正具有想象力的研究本身就是一种社会行动，有其特定的价值预设：理性和自由。社会学要通过其研究本身就是行动的这种教育来实现，或者说现代意义上的大学要通过有想象力的社会学来实现对大学生和公众群体的教育，培养出具有自我教育能力的个体和公众。这就是米尔斯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一书中所隐藏的社会学对通识教育的三重承诺。米尔斯在这部著作里的工作只是一个代表，社会学研究在经典时期曾经存在着与大学教育之间的亲和力关系。今天，这一关系伴随着社会学越来越趋向于职业化与专业化而逐渐消散，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在社会学的研究领域不存在大学教育尤其是通识教育的理论资源。恰恰相反，社会学对教育的承诺是社会学研究自身的题中应有之义，社会学也应该在这个意义上为大学教育贡献自己的力量。

(责任编辑：温莹莹)